

✧ 繁星文丛

中山国史话

王颖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繁星文丛

中山国史话

王颖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山国史话 / 王颖 著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5
(繁星文丛)

ISBN7-104-01272-9

I. 中... II. 王... III. 文学理论 - 研究 - 中国 - 当代
IV. I0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7266 号

《中山国史话》

王颖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河北省固安县印刷厂 印刷

2000 千字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140 印张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104-01272-9/I · 510

定价:235.00 元

前 言

历史，如一条长河；而河流，也沉淀了无数的历史。在世界的每一片陆地上，河流，作为生命的给养者，都是最值得尊重与宝贵的。它不仅灌溉着两岸的土地，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辛苦劳作的子民；更重要的是，它滋养着文明，促成文化的繁荣与传播。长江、黄河是华夏民族的灵魂，其伟大与光荣是每一个炎黄子孙乃至世界各族人民所共知的。而除此之外，文明的诞生也离不开另一类的河流：它们也许并非源远流长的；或者也算不上“浊浪排空、惊涛拍岸”的；它们只是终年默默地流淌着、不知在什么时候，就悄悄地消失了，只剩下一道干涸的古河道和沿途的一些传说，让后人禁不住要去探寻它的神秘，追寻它曾经的风光。而在一番反复的探查之后，欣然于它曾孕育的文化，惶感到历史对它的语焉不详，也赧然于自己对它的无知。

不要误会，本书并不是要为一条河流作传，不过是作者在面对着一段若隐若现的历史时生出了一种感慨，而恰好这段历史又是真的由一条这样的河流生发而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可以说是面对这二者时同样的叹息。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条河流、怎样的一段历史、怎样的一种文化呢？让我们把眼光投注在中国的河北省——先民称之为冀州的地方。

太行山脉如一道天然屏障把河北与山西阻隔开，然而却有一条河，由遥远的太行山西侧一路逶迤东来，穿越太行山，来到开阔的河北平原，这就是滹沱河。据《山海经·北山经》所载：“北次三经之首，曰太行之山。……又北三百里，曰泰戏之山，无草

木，多金玉。……滹沱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淦水。”在春秋初年，随着滹沱河水东来的，还有一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鲜虞。这支游牧民族在水草丰美的滹沱河边安下营帐，就此开始了定居的生活。到了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这片依山傍水，“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的土地上，又崛起了一个敢和强国争锋的千乘之国——中山。尽管它摄于大国之间、命途多难，先后败亡于魏、赵之手，历史仅二百余年；但当它存在时，却令三晋、齐、燕等大国不敢轻忽，而在仅论纵横风云的《战国策》中也不得不为它另辟专席，这样一个国家，不能不算是领一时之风骚了。

由于历史材料的短缺，以至于这样一支神秘的民族和这样一个奇异的国家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间极少被人了解，无论如何也该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遗憾吧。所幸的是自一九七四年到一九八七年间，河北省的考古工作者们在河北省平山县滹沱河的北岸发掘出了中山国的都城遗址和中山王墓，随之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当一九七九年初，这一消息刚刚向世人公布，就引起了考古学界、历史学界等诸多专家的浓厚兴趣。各方面的专门研究也纷纷亮相，使沉寂了两千余年的古中山国得以重见天日。此后，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深入进行，又陆续有人进行不断的探索研究；然而至今为止，关于中山国的整体文化研究尚未有人进行。说到冀州文化，世人仍只知有燕赵而不知中山，这未始不是每一位河北人的遗憾。基于此，笔者将自己先前关于中山国的一些认识和了解为起点，进一步详细考察了中山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借鉴前人成果，再加上一些大胆的拟测，敷衍成文。不敢妄言有得，只希望能为家乡河北的古文化研究提供一些线索，略尽绵薄之力吧。

一九九九年八月六日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先秦时期冀州的文化发展与民族状况	(1)
第二章 鲜虞与中山国史迹略述	(15)
第三章 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的发掘及其价值	(37)
第四章 中山国的疆域和交通状况	(50)
第五章 中山国的内政与外交	(65)
第六章 中山国的经济状况以及货币形式	(84)
第七章 中山国的政治文化思想风貌	(99)
第八章 中山国的文字特色	(109)
第九章 奇丽的中山国文物及由此显示出的审美取向	(124)
第十章 平山三器铭文集释	(135)
附录 一、平山三器铭文摹本	(176)
二、参考书目及论文索引	(194)
后记	(199)

第一章 先秦时期冀州的文化 发展与民族状况

“茫茫禹迹、划为九州”，相传从大禹时期，天下就已经被划分为九个大的区域了。而河北这一带被称为冀州，却又似乎更早。当女娲娘娘炼五色石补苍天后，就又“杀黑龙以济冀州”。在九州之中，冀州无疑是最古老的名称了。然自秦汉之后，河北一带又有了另一个别名——

“燕赵”，这是因为在战国时期，这里有北燕南赵两个大的诸侯国。直至今天，这一别名仍被广泛的用来代指河北，如我们常说的“燕赵文化”等。渐渐地，人们的思维就被这一名词束缚住了，一提及河北的古文化，似乎就只能想到燕和赵，除此之外再无其余。而事实上，当战国之际，燕国占据的是河北省的东北一角，即今天的北京一带，其国土还有一部分在今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赵国则偏于河北省南部邯郸地区，国土之大部分却在今山西省境内。所以严格地说来，这两个国家并不能就代表了河北。在河北的腹地，省会石家庄地区及保定地区，不仅土壤肥沃、依山临水；更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时有鲜

虞民族集团，战国时又有中山国，都在这里繁衍生息，与燕赵相抗衡。

冀州中部这块土地，西据太行，山高林密；东临滹沱河平原，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无论是狩猎、农耕还是畜牧，均得天独厚，这分明是滋养文明的温床，没有理由直到春秋战国之际才从蒙昧中被游牧民族的马蹄声唤醒。那么在鲜虞人到来这里之前，又该是怎样一种样子呢？我们不妨从历史的远源寻起，先把眼光放到整个华夏文明刚刚萌芽的原始时代去。

* * * * *

中华民族的历史，有文字记载、比较可靠的是从夏代开始的。那么夏代之前的历史又如何去探索呢？传统方法不外两种：一是考古发掘；一是对神话传说加以分析整理，去伪存真。尤其是综合使用这两种方法，可以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我们对史前时代的认识。我们考察古冀州的风貌，也可以由此入手。

根据对史前遗迹的发掘，中华民族的历史已被追溯到一百七十万年前（元谋猿人）。而猿人时期文化遗存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就是古冀州。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不仅能制造工具（石器），更掌握了用火，使人类文明的火光自五十万年前就照亮了古老的冀州大地。到距今二十万年前到四万年前的古人阶段，不仅北京周口店有龙骨山人承继着文明的薪火，在太行山西麓，山西省平定、寿阳一带也出现了更为进步的文明。河北省南部是黄河的古河道，这条大河也孕育出文明的种子。再到距今一万年前，人类的直系祖先——“新人”出现

时，文明的程度进一步加深，覆盖面也更加广阔：北到内蒙古、西到陕西、东至山东、南至河南，整个北方都是一派文明觉醒的新气象。“新人”们不仅掌握了钻孔技术，发明出渔叉、弓箭，还学会了营造住宅、缝制衣服和人工取火等。我国神话传说中的黄帝轩辕氏、炎帝神农氏以及燧人氏、有巢氏等大约均为这一时期的部落首领。在这广阔而深厚的北方文明中，冀州处于中心的位置。

在“新人”时期，我国的原始社会已进入新石器时代。从考古发掘看，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遍布大河上下。河北省的中部地区先后被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所覆盖；北部及东北部则属于新石器文化的范围。一般认为，仰韶与龙山文化是夏族或华夏族的文化，而新石器文化则是北狄民族集团的文化。可知从最初的时候，冀州就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汇地。虽然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冀州中部的居民及其统治者究竟属于哪一民族，学术界仍存有争议，但考古已经证实，在三代之前，这一地区的文明是仰韶与龙山文化，民族乃属华夏族。无论从文化性质还是进步程度看，均与黄河上游的陕西、中游的山西及下游的河南是同样的。

我们还可以从神话传说中找到线索，据《史记·五帝本纪》载：北方姬姓部落的始祖黄帝曾与南方姜姓部落的始祖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后来黄帝部与炎帝部合并，构成后来华夏民族的主干。又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在打败蚩尤后“诸侯咸尊轩辕氏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作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黄帝寻视自己的疆土，“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

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涿鹿在哪里，众说不一。笔者赞成涿鹿即今涿州之说。一则这里是文明的最早发源地，有着几十万年不间断的人类火光；二则据南朝·梁·任昉《述异记》云：“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黄帝与蚩尤在涿鹿之野作战，当地人民留有古老的记忆，可证涿鹿确在冀州。涿鹿是黄帝部落的根据地，故而他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后仍在此建都邑；而且可以坐镇北方，时刻阻挡北方包括荤粥在内的北狄民族南侵，可谓一举两得。

冀州为黄帝部落的根据地，文化的中心，然而为什么其后的影响反不及陕西、河南等地呢？主要是在黄帝时代结束后，先后崛起的夏、商、周三个王朝均偏离了冀州，分处于陕西、山西及河南一带。尤其当黄河改道之后，河北的邯郸、沧州地区也如同那古河道一般渐被尘沙所掩，不复当年的光彩了。但需要认清的是，文明的重心虽然转移了，并不意味着冀州从此被摒弃于文明舞台之外。实际上，冀州的文明从未间断过。由三代至春秋战国，文明在这里悄然生息，融汇着华夏与北狄的不同血脉，于是才有了燕赵的故都风流和中山国的独具一格的灿烂文化。

* * * * *

当中国历史进入第一个王位世袭的朝代——夏的时候，华夏文明的中心点位于夏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阳城，并且随着夏王朝征服的脚步向东西两侧扩张。向西，“甯三苗于三

危，以变西戎”，渡黄河而达今山西省南部，故其地被称为“大夏”。《史记》言：“禹凿龙门，通大夏。”昔人又谓禹都安邑，都是指山西省南部中条山以南沿黄河一带而言。向东，则沿黄河顺流而下，渐次达于今河北、山东境内。《左传》所载东夷首领后羿、寒浞与夏争王，并有太康失国、少康中兴等事，即夏族势力东扩而与黄河下游原有的民族势力相接触的证明。其间涉及到的有穷氏、有鬲氏等部落，位于紧靠河北南端的山东德州一带；还有一个有易氏部落，位于河北易县一带，是夏王朝势力的最北端了。由此可知，从易县往南的河北省中部及南部地区，乃是夏王朝的必然统治区。所以到了战国时代，在这一地区建国的中山，其文化带有夏族遗韵也就无足为怪了。甚至有人推测，“中山本为尧舜禹一系夏族遗民，乃以岐异于周族宗法文明而蒙‘戎狄’之落后称号。”进而更大胆地推论以夏族祖先大禹为圣人的墨家钜子墨翟为“中山国之遗民”，“中山国文教中心且具有决定作用者其为墨学无疑。”（见顾颉刚遗稿《战国中山国史札记》）这一推论正确与否且不必说，单是它一针见血地指出夏、中山与墨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点，就非常具有启发性和开创性了。

我们已经知道在三代之前的河北中部地区乃是黄河流域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居民为华夏族的一支。所以到了夏代，东夷民族的有穷氏极力对抗夏王朝的统治，而位于北方，本可以让夏王朝鞭长莫及的有易氏却无声无息地臣服，这不能不使人追想其民族与文化性质上的血统关系。

在夏王朝统治历时约五百年后，一直臣属于其势力之下

的华夏民族的另一支——商族在东方逐渐强大起来。商汤革命，取夏王朝而代之，于是华夏文化的中心随政治而迁移至黄河下游的河北、河南一带。商王朝曾多次迁都，其最初的栖息地众说不一，其中有一种于我们研究中山国文化非常有意义，即殷商民族最早是聚居在河北省的平山县一带的。那里近年来发掘出一些甲骨，其上之甲骨文据说与殷墟甲骨有所不同，是更为古老的文字。而研究中山国文化时亦可发现，无论其文字，艺术等各方面均带有殷商的遗迹，与宗周之正统文化略有差异。而平山当地的民间亦流传着商民族始祖契的种种传说。到盘庚迁都之后，政治文化中心转移到河南安阳，这是河南省北部的一个所在，与河北极近，且交通非常便利。至商朝末年纣王在位时，殷都的规模已经极大，南据朝歌，北据邯郸、沙丘，处处离宫别馆，“聚众百万，左饮淇水竭，右饮洹水不流。”有人曾拟测殷王朝的势力范围，把殷都与周族定居的陕西岐山、丰、镐一带连接起来，以此距离为半径，围绕殷都画一个圆周，大约就是殷王朝鼎盛时期的疆域了。而河北的中部、南部至河南的北部正是处于圆心的位置，其为殷民族的聚居地自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殷商时代曾经的繁华在冀中地区影响极深，所以直到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之际，这里的风俗依然是“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淫昏康乐、歌谣好悲。”（据《吕氏春秋·先识》）“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据《史记·货殖列传》）而中山王墓出土的大批精美华丽的错金银赏玩铜器，也直接证明了这种奢

华风气的延续。过度的奢侈固然是每个王朝末世的症状，但在先秦时期，以殷商王朝尤为突出。何以会如此呢？仅以夏、商、周三代对比来看：一条黄河由西向东，夏民族的居地位于河南、陕西、山西交界地区，其上游是位于泾渭流域的周民族，下游则是据河南、河北、山东交界处的商民族。而文化的表现总是与自然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一般来说，上游地势高，气候、土壤条件较差，生活文化于艰难中诞生，水平相对较低，但居民却强悍勇武，且具有团结精神，是天生的征服者。而下游地势低，气候相宜，土壤肥沃，生活文化早熟而优裕，但居民却较为文弱，易陷于奢侈淫佚，成为天生的艺术家和被征服者。三代之前的北方黄帝之所以能取代南方炎帝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就已经有这种因素在起作用了；而三代相递的事实又证实了这一历史必然趋势；其后的秦统一六国更证明了此说不谬。三代之中以殷商的文化最为发达，是孔子所谓的“先进”，儒家文化即根源于此，影响中国几千年。但其命运则是先臣服于夏后颠覆于周，与其文化的发展恰成对照。

对于冀州而言，殷商时期是它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商代青铜器上常见一个族徽标志：有人推测为“冀”字，那么是否与其聚居地冀州有关呢？我们目前不敢妄下断语，但冀州的商文化应该是无可怀疑的了。

* * * * *

据典籍记载，三代时期中华大地上的居民大致可归入五大民族集团：除了居于中原的华夏族外，还有四方的“夷狄”，

《礼记·王制》云：“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由此可知，自古以来，就有着中原华夏之外的四方民族，而且他们与华夏族相互往来，各有其文化而又互相影响交融着。居于中央的华夏族，试图征服四方民族，夏代与东夷族的斗争、商代对鬼方、夷方的征伐都促进了华夏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到了周代，不仅要征服商遗民，也从未停止对四方民族的安抚或征伐。由此疆域进一步扩大，出现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这种政治上的大气象自然带来了文化上的大交流与大繁荣，最终使周文化集三代之大成。

前面已指出，冀州是商民族的聚居地之一。同时，这里也是华夏族与北狄民族集团相交接的地方。到了周代，这里不仅成了周文化与殷文化碰撞交融的所在，更是整个华夏文化与北狄文化融汇贯通的结合部。此时南方有集南蛮文化与华夏文化之大成的神秘楚文化；东方则是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携手的齐文化；在冀州中部地区，则孕育生成了具有华夏和北狄双重特色的中山文化。

周初对商遗民采取了两种统治措施：一是为防止殷贵族叛乱，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都，由周武王的三个兄弟留驻监管，称为“三监”；二是设置统治据点，分别派亲族去统治各

地散居的殷遗民。如封周公旦于鲁（今河南鲁山县），封召公奭于燕（今河南郾县），封姜尚于齐（今河南南阳附近）等，所封之国全在成周南部或东部，正是为着震慑殷遗民。管蔡之乱后进行第二次分封，首先把大批被俘的叛乱者迁到成周集中管理，派八师兵力进行监督，然后大肆分封宗族以加强统治。据《荀子·儒效》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这一批诸侯国中重要的有鲁、齐、宋、卫、晋、蔡、燕等。鲁从河南迁至山东曲阜；齐迁至山东临淄；燕迁至河北易县，后又徙于蓟（今北京附近）；晋是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地，在今山西翼城附近；蔡在河南上蔡；而宋、卫两国仍是在殷遗民集中的地方：宋在殷商早期的根据地商丘，卫则在河北南部。经过此番分封，周王朝的势力进一步展开，不仅控制住了殷商故地，不必再担心遗民叛乱；而且还加强了对四方民族的有效管理。东有齐、鲁，北有燕，西有晋，南有蔡及成周，可谓内外兼顾了。

到了稍后的春秋时期，在冀州中部出现了一个名叫鲜虞的政权。有人推测其为子姓的殷族后裔所建，根据有二：一是据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姓氏篇》载：“（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子食采于朝鲜，因氏焉。”（按，“食采于朝鲜”当是“食采于鲜于”之误）；二是一九七七年天津武清出土一块东汉鲜于璜碑，其碑铭称鲜于氏为“箕子之苗裔”。这两条证据所能证明的应当是作为姓氏的“鲜于”乃是子姓殷族的后裔，但不能因此说鲜虞国就是子姓殷族所建。事实上，鲜虞一名可以从地理上找到源头。《山海经·北山经》云：“石山，鲜于之水出焉，而南注于滹沱。”（于、虞二字古可通用）鲜虞政权当得

名于其地。而且就当时的形势看，一直小心翼翼防备着殷遗民的周王室怎能容许在河北的腹地又出现一个由殷商旧贵族领导的国家出现呢？从情理上讲，这一地区会有相当数量的殷遗民，甚至可能有箕子的后裔在内，但不可能有一个属于殷族的国家或政权存在。所以，冀中地区，在周王朝的严密控制下，是逐渐归化于周族文化的。鲜虞最大的可能是由北方民族的一支迁来此地定居的。远方的移民尽管带来了自己的文化色彩，毕竟要融于当地的大环境内。冀中地区的殷商遗民虽也在努力保持着旧的文化传统，毕竟也抗拒不了历史的大趋势。是以到了后来，周族文化控制了这一地区，仅给殷商文化和外来的北狄文化留出了几分表现的空间，战国时期的中山国文化正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现在我们可以不妨再把注意力转移到北狄民族集团这一方，看一看这一民族是怎样与华夏族逐渐相融的。

北狄族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它涵盖了自黄帝以来，甚至在更早以前就存在于中国的北部、西北部及东北部的绝大多数游牧民族。其内部成分非常复杂：较早的有荤粥（又称獯鬻）、山戎、严允（又称狁狁）、犬戎等，周代又有赤狄、长狄、白狄等分支。这些民族本来在北方过着狩猎畜牧的生活，其文明性质明显区别于以农耕为基础的华夏族。然而民族的交流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当中原一统时，势必会对四方进行征服；而当中原割据纷争时，又总会有一些失势的贵族逃往四方，也会有人拉拢悍勇的边地民族作为自己政治舞台的支柱。于是华夏文明更多地传入四方。同时，生活的动荡不定使边远地区的民族也向往着安定富庶的中原，他们或者

呼啸而来，劫掠而去；或者迁移到离中原越来越近的地区，终至与中原民族杂居共处。在两种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相遇合的地方，总会繁衍出兼双方特色的富有生命力的新文化。有周一代，与中原华夏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就是戎狄了。（四方民族的名称与居地并非一成不变的，但居于北方和西方的狄族与戎族自古并称，戎狄一家，可不必细究。）

周民族的始祖后稷曾任虞夏的农官，到了他的儿子不窋继任时，夏政衰，于是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并在那里繁衍生息起来。自此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周与戎狄同俗。直至古公亶父迁于岐山之下，才“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宫室，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所以说周与戎狄自开始就有着血统上的联系，戎狄中也有姬姓者，乃是不窋的后裔。但当周族日渐强大独立之后，就有意识地把自己和“蛮族”区别开来。到了他们取代殷商成为天下共主之后，更是以正统自命，极力贬低后进民族，并且不断征讨他们。最著名的就是周穆王自洛邑渡漳水，绝太行、循滹沱，北征犬戎了。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周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却死于犬戎之难。在近三百年的西周史中，戎狄不断与周族以和平或非和平的方式纠缠着，并且有些部落已经渐次迁徙到中原。《左传·昭公四年》：“周幽王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可知此时戎狄已在河南西南部的太室山一带出没。此后中原纷乱，更给了戎狄以可乘之机。孔子曾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指若无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尊王攘夷，阻挡了戎狄的进一步入侵，那么后来的中原将是戎狄的天下了。可知在当时戎狄的势力已深入中原，并引起了华夏诸侯的极大恐慌。